



日本研究论集

RIBEN
YANJIULUNJI

1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日本研究论集

1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本书的出版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日本研究论集

1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350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25千 印数:1-1000

ISBN 7-310-00952-5
K·67 定价:25.00元

前言

《日本研究论集》问世了。它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愿读者与我们共享这一创生的喜悦。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于1988年4月,是综合研究日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构。站在实事求是的科学立场上,以严谨的态度和多样的方法,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争取有所创造,有所发现,使我国的日本研究既能与世界各国学者对话,又独具特色,这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员的共同目标,也是《日本研究论集》的宗旨。《日本研究论集》今后发表的论作,将显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上述目标与宗旨。

90年代后,中国学界出现变化,少了些浮躁与空疏,多了些冷静与扎实。有些学者主张建立学术规范,提倡微观与实证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毋须再讲“经世致用”,也不意味可以忽略在宏观把握与思想深刻上下功夫。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今天,以多学科方法展开的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国际学界的大趋势。作为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只有兼具精专与广博,才能在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日本研究学科方面有新建树。因而,《日本研究论集》不拘一格,愿意刊登富于创造性的各种类型日本研究论文。

创办自己的学术园地,是我们的夙愿。其实,早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期,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就曾刊行不定期刊物《日本历史问题》,后因财力不足无奈辍刊。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后,已不满足于将其复刊,而要创办涵括更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刊物,以充分反映全体成员的研究风貌。同时,《日本研究论集》亦非狭隘的同仁刊物,它热诚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的来稿。因为,在灿若群星的日本研究刊物中,《日本研究论集》毕竟是新兵。在这块学术园地上,与国内外学者交流研究心得,切磋琢磨,争鸣指谬,才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并使《日本研究论集》日臻成熟。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目 录

前 言

论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政党政治·····	万 峰(1)
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精神构造·····	王金林(30)
日本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石井宽治(46)
古代中琉疆界记实·····	米庆余(76)
孙日关系研究方法论·····	俞辛焯(90)
1935年“中日亲善”评析·····	宋志勇(128)
《政治资金规正法》述论·····	王振锁(140)
日本暴力团及其政治参与·····	余干生(154)
日本的产业合理化及其理论分析·····	杨栋梁(169)
“入关”前后日本的经济外交·····	张 健(185)
日本泡沫经济分析·····	薛敬孝(202)
综合商社在日本外贸发展中的作用·····	傅春寰(222)
略论日本古代氏族政治及其历史影响·····	李 卓(240)
“物哀”论考·····	姜文清(255)
兰学述论·····	赵德宇(270)
一位近代教育先驱者的日本考察实录·····	武安隆(285)

基督教在战后日本的传播.....	孙雪梅(289)
略谈日语口译.....	吴爱莲(306)
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	
——兼论翻译标准的设立原则	高 宁(319)
日本人的姓名观.....	刘桂敏(331)
日本人的“人間”观	
——“人間”、“世間”、“人”三词刍议	王健宜(339)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员科研成果目录.....	(356)

论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政党政治

万 峰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日本研究论集》现已创刊。这对于全国日本史学界和日本研究界是一个莫大的喜讯。国内已有若干日本研究的刊物,现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这份刊物的问世,定会为我国日本史研究和日本研究增添新的光辉。学术刊物是培养人才、推进研究的论坛和重要阵地。值此《日本研究论集》创刊之际,谨致以衷心的贺忱,同时献上拙作一篇为这份刊物的扬帆启程聊表壮行之意。

* * *

长期以来,人们在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中对近代天皇制的政体往往深入不够。从国内外的研究史上看,论争不少,且有的声势规模都很可观。然而正因为论争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一个问题上,并且久久缠绕而难以脱身。因此,近代天皇制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甚至无一定的课题意识。我以为近代天皇制的政党政治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课题。本文拟对此作一点粗浅的讨论,以便唤起史学界同仁的学术兴趣。如有不妥和错误,还望同仁们多予教正。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的历史特点

何谓“政党政治”?质而言之,就是在实行议会民主主义政治

原则的国家,靠国会里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成内阁(政府)来运营国政的体制。政党政治是一种体制,是一种制度,决不可简化为“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公式。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政党存在就是政党政治。这里有一个政党组织内阁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将政党内阁与政党政治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政党内阁是政党政治的唯一标志。这样会导致观点片面、僵硬,妨碍全面地把握问题。我们这里说的近代政党政治是由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率先实行的,日本则迟了很多。不仅迟了,而且由于国情不同,生出了一个日本式近代政党政治的“丑小鸭”。政党政治,按西方国家和日本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有共和制国家的政党政治,如美国;也有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党政治,如英国和普鲁士德国等。美、英、德这三个国家都构成各自不同的模式,而日本虽效法其中的一个,即普鲁士德国,但又有其独特之处。国家元首有总统和君主(国王、天皇)这一点姑且不论外,作为近代政党政治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有由一部宪法规定所产生的国会(议员=政党)和内阁(政府)。这些共同点的要素缺一不可,少了一样就构不成近代政党政治。不言而喻,共同点是彼此一致的,但不同点却各有自己的特色。

那么,让我们看一看日本近代政党政治有什么特点呢?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近代政党政治有许多明显的、历史地形成的特点。我想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条:

第一、日本近代政党政治是近代天皇制的政党政治,也可说是日本式的近代政党政治。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其余各条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撇开近代天皇制也就谈不上日本近代政党政治。明治维新后通过1889年颁行《大日本帝国宪法》(简称“明治宪法”)和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简称“议会”或“国会”)正式确立了近代天皇制统治体制。日本这一近代君主立宪政治体制,通常被称为“明治宪法体制”。史学界对于日本近代天皇制或明治

宪法体制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评价。不过,按照我的看法,日本近代天皇制作为近代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它是一种包容相当多封建因素在内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近代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神化的皇室不消说,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半封建寄生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统治国家时,天皇这一日本君主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权,但又不同于非立宪的中国清朝皇帝那样的封建君主。天皇还是要在外表上、法律形式上按照立宪君主的一些规范行事,所以已故的昭和天皇爱谈他作为立宪君主行事如何如何。总之,我们可以说日本近代立宪君主制即近代天皇制,有专制的一面,也有立宪的一面,即半专制半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制。凡谈论明治宪法体制的人都不能对其两面性、双重性视而不见。翻开明治宪法,这种两面性、双重性随处可见。举凡封建的“万世一系现人神”的天皇与近代的君主权、主权在天皇与臣民的微薄权利、天皇一切大权独揽与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敕令可定国会开闭及内阁存亡,等等,发人深思。而自明治宪法颁行以来,日本学术界与政界、舆论界一再掀起“主权在君”与“主权在民”的大争鸣、大论战,就反映了这一体制的特质。就其与日本近代政党政治的关系而言,因为它是近代天皇制的政党政治,所以按明治宪法规定,与它有关的国会运营、政党参政、执政等等都要对天皇负责,听凭天皇裁可或处置。而西方国家的内阁(政府)则是对国会负责,国会又是对国民负责。又因为明治宪法体制有上述的两面性、双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矛盾对立的发展,以致其中哪一方占了主导地位,都对近代政党政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内阁先于国会登上政治舞台。日本近代内阁制度建立于1885年,比明治宪法颁行和开设国会早四五年。这一内阁早产的政治现象,不能不给日本近代政党政治打上一个烙印。这就是,日本内阁(政府)一开始就不是政党政治范畴中的内阁;反之,日本政党政治有颇滞后于内阁(政府)的重大缺陷。严格说起来,日

本正宗的政党内阁诞生于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比内阁晚生近 40 年之久;尽管在这以前偶尔有过一两个初步的政党内阁和若干个有政党政治色彩的内阁。这一重大缺陷的造成,是由于明治宪法的炮制者伊藤博文为保留藩阀有司专制势力的统治地位和防止政党无拘束地过早争夺政权而预设“机关”所致。正因为这样,相当长时期内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藩阀专制势力与政党政治相抗衡,竭力抵制后者。这使日本政党政治发展极不成熟,甚至有流于“畸形儿”的危险。

第三、在日本,近代天皇制这种近代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确立前后,近代政党的发育极不健全。明治宪法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蓬勃开展的自由民权运动强大冲击下,统治当局被迫派人去普鲁士德国取经,而搞出这一部东方空前的钦定宪法。在这场争取民约制宪的群众政治运动几经曲折、分裂而告终后,及至明治宪法颁行、开设国会,当年日本仅有的近代政党是来源于自由民权运动中产生的政治团体,如堪称近代日本第一个政党的自由党,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明治宪法体制确立后是在这种瘠薄得可怜的政治土壤上抚育近代政党的,也就是史家所称的“政党化进程”。然而,也正因为先天不足,日本的近代政党政治和政党化进程出现两种不那么寻常的情形。一是立宪后有自上而下由藩阀官僚主导,并拉拢一部分自由民权运动中产生的近代式政团结社的人参加创立政党。但这并非“御用政党”性质的政团,而是具有“民党”面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再就是一次大战后日本出现一批挂着“工农大众”牌号的政党,日本史上称为“无产政党”。它们也时有参加选举而进入国会的,但都未能达到执政党地位。它们稍一左倾便有被查禁的危险。因此,看来是合法政党,但实际上只是半合法政党。它们标榜代表工农大众利益,从而也构成了近代天皇制的政党政治的一个特色。

第四、三驾马车式的政党政治。由于明治宪法规定了军队统

帅权独立,军部享有帷幄上奏特权,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军部地位举足轻重。它与藩阀官僚以及政党构成近代天皇制统治体制内鼎足而立的堪称“三驾马车”的三大势力格局。当然,这三驾马车之中,政党的力量不可与前两者同日而语。但这却使近代天皇制的政党政治增加了一个新的特征。这就是日本近代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在与军部、藩阀官僚对立斗争和争夺政治权力时有相互排斥一面,也有相互勾结一面,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可以商定轮流坐庄掌政,或者彼此勾结起来问鼎政权。

第五、近代政党化过程的特色离不开近代天皇制的历史演变。说到日本近代政党政治的历史特点,便不能不看到近代天皇制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有哪些是赋予政党政治以特点的。我们知道,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有一个历史过程,而它一旦确立也不是一成不变,尽管万变不离其宗(“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但也有相当重要的演变。1868年日本发生明治维新,改元明治,从此走上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当时日本人叫它做“王政复古”和“御一新”。这是针对经过倒幕维新运动推翻了使天皇大权旁落近700年的“武家政治(武士封建领主统治),恢复了天皇亲政,并且由天皇主持变法一新。明治维新“王政复古”在西方文献中译为“明治(王政)复辟”(Meiji Restoration)。明治初期建立的政府是天皇政府,但那还不是近代君主立宪的天皇制政府,是以藩阀有司官僚专制为主导的逐渐向近代天皇制过渡的政府。这个阶段的政治势力积淀,既影响到不久将确立的明治宪法体制,也必然影响到以后的政党政治。这个阶段不必多说。但是,对政党政治有直接重大影响的演变,则是本世纪10年代初进入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后的演变。1912年7月明治天皇逝世(在位45年),嘉仁天皇即位,改元“大正”,由此进入大正时代。随着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帝国主义过渡,地主与资产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此消彼长,同时政党和社会舆论要求打破藩阀专制的声势日烈。要求

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工农和社会主义运动也在抬头,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权力重新分配的争斗。这一切促使近代天皇制体制发生新的演变。大正民主运动代表了时代潮流,也是这一社会矛盾运动的总爆发。所谓“大正民主运动”,大体上始于大正初年。1912年12月第2届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军部提出增加两个师团的要求,被军部动用统帅权独立这一“杀手锏”倒阁而下台。继之上台的军部巨头桂太郎组成的内阁,于1913年被声势浩大的民众护宪运动冲击而倒台。史称“大正政变”。这就是第一次护宪运动,也可说是大正民主运动的开端。“大正民主运动”就是以始于大正初年的护宪运动(打倒桂太郎内阁)经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年的米骚动至1924年第2次护宪运动直到1925年普选法成立的政治上的护宪、民主运动为轴心,连同社会上普遍呈现的自由主义氛围高涨的时代潮流的总称。^①大正民主运动对近代天皇制演变起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在这期间,政党政治逐渐走向正轨,即日本史上称为“宪政之常道”,其具体成果就是本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大约8年间构成一个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格局。虽然这逊色于西方近代政党政治,但就日本来说实属来之不易。这段历史赋予日本近代政党政治以夭折的“宪政之常道”的特点。

与此相反,自本世纪30年代初起,随着战争和国家法西斯化的加紧推进,近代天皇制进入法西斯化即军国主义统治体制法西斯化的时期,直到1945年“八·一五”战败因而近代天皇制随之终结为止。军部法西斯专政确立后,以“举国一致”内阁为幌子,来掩饰其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军部逐渐排挤和取代政党地位,成了纳粹式一国一党的日本版本。表面上,宪法、天皇、国会、内阁、政党都存在。但近代天皇制已发生蜕变。政党政治于1932年“五·一五”法西斯政变事件后宣告终结。后来,政党经过分化、向军部靠拢、协助战争与法西斯,直到1940年成立法西斯的大政翼赞会

时,已有政党均纷纷解散。这就更彻底地结束了自明治年间以来的日本近代政党的历史。可见,这段历史赋予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夭折于法西斯化的一个新特点。

近代政党化与政党政治

纵观日本近代政治和社会运动史,我们看到日本近代政党化虽然大大落后于西方欧美国家,然而在东方则是开了先河的。这一历史进程,可以上溯至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在这一史无前例的群众政治运动中,不仅日本人民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来自西方的种种自由和人权学说(以他们当时所能获得的知识和所能理解的程度),而且纷纷组织各种政团结社。我们知道,1874 年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组织爱国公党发动了自由民权运动。爱国公党算是第一个政党式的政团结社,其影响也不小。但是,到 1881 年 10 月由板垣退助任总理成立的自由党,才是日本创建近代政党的嚆矢。翌年 3、4 月间,由大隈重信任总理的立宪改进党成立,同年 2 月由尾崎行雄、犬养毅等人成立的东洋议政会并入该党。这是继自由党之后在近代日本曙光期出现的又一个近代政党。这两个党都提出了实施宪政的鲜明纲领,都有颇大声势和规模。正是这两个党揭开了日本近代政党化的序幕。

1889 年明治宪法颁行、1890 年国会开设后,近代政党化正常地开展起来。在自由民权运动后期产生的政团结社也逐渐向政党发展。而原有的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两党也有重新组合的趋向。板垣的自由党是在这以前的 1884 年 10 月解散的。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分裂、瓦解,在国会开设当年板垣成立第二个爱国公党。大井宪太郎恢复自由党。同年,爱国公党、自由党(大井)、九州同志会、大同俱乐部等组织解散,成立统一的立宪自由党。翌年

该党改名自由党,仍由板垣任总理。时隔5年后,1896年立宪改进党与立宪革新党、中国(日本地区名)进步党等合并成立了进步党。于是从国会开设前的自由与立宪改进两大党并立发展为国会开设后自由与进步两大党比肩而立的局面。两年后,1898年6月自由与进步两党合并成立宪政党。但不久,同年10月又分家,宪政党中旧自由党系统由星亨带头决定解散宪政党成立新党,党名不变。旧进步党系统的人则成立宪政本党,以示区别。这标志着日本近代政党化进程有了扎实的进展。谈到日本近代政党化和政党史,不能不说这是开创时期的重大成果。而且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还必须指出,宪政党的成立是事出有因,是近代政党产生后在国会斗争的需要。1898年5月30日第3届伊藤博文内阁向国会提出了成为悬案的增征税收法案。对此,自由和进步两党一致反对,中立派议员也几乎无人帮政府解围。结果在国会表决时,反对者以绝对优势否决了这一法案。自由与进步两党本来可谓政敌,但这次抱成一团与政府在国会的御用党派斗争并获大胜。进而,两党干部举行会谈后决定成立新党,取名“宪政党”。该党俨然反政府的在野党一大势力。该党由原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和原自由党首领板垣退助共同领导。该党与政党政治有密切的因缘。它在成立时通过的宣言与纲领中提出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要建立政党内阁,即由政党出身的人组成的内阁,后来确实也有所实践,尽管那是极为短暂的一次尝试。

在日本近代政党化进程和政党史上,由藩阀军政巨头亲自出马创立政党的有两例。一是伊藤博文创立了一个新党。伊藤之所以要亲自创立一个政党,是出自巩固政权的需要。他认为实行立宪君主制后在国会里要达到立法的目的,只有靠政党行事。他曾向大隈重信说过:“萨长党派已无实利。与今天议会里欲达到立法目的的党派因不可同日而语。”^②因此,为了保住统治阶级的江山,为了政府的立法议案能在国会畅通无阻,他下决心要创建一

个维护政府的、得心应手的政党,而且是能在国会与反政府的在野党抗衡的大政党。他设想这样的党真正是维护国家政权的、有纪律的党,而且要吸收对国力发展出大力的资本家实业家阶层加入。换句话说,要创立一个既代表地主阶级又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党。这是一个由政府掌握主导权的长期稳定的近代政党。伊藤为此甚至于与山县有朋发生激烈的争吵。山县是藩阀军阀元老,他终生反对政党、反对政党政治,对于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府深恶痛绝,甚至千方百计为政党人士登上宦途设置重重障碍。然而,伊藤毕竟是藩阀中的开明派、宪政派,他不顾山县反对,拉拢宪政党的星亨、末松谦澄等一批干部,商定使宪政党加入新党。1900年9月13日宪政党解散,15日新党宣告成立,伊藤博文任该党的总裁。为便于官僚和实业家加入起见,新党定名为“立宪政友会”(简称“政友会”)不标出“党”的字样。然而,尽管伊藤是藩阀的开明派、宪政派,他为了维护皇权,还在党纲、宣言中强调内阁成员任免大权在天皇,不一定采取政党内阁原则。这表明伊藤在政见上与山县有相通之处,也不欣赏政党内阁。所不同者,伊藤可以容忍,甚至鼓励“标榜天皇主权大义”的政党内阁。然而,政友会后来的发展表明在政党政治或政党内阁原则上并非没有违背伊藤初衷之处。政友会成立的第一个即第4届伊藤内阁,就有浓厚的政党内阁的色彩。更不要说后来由政友会组成的政党内阁屡见不鲜。当然,从都是“天皇主权大义”下的政党内阁这一点来说,是无损伊藤的政党论的。

从日本近代政党化和政党政治史上看,政友会是一大政党,其地位举足轻重。1900年成立时就有150多名议员加入,在众议院成为超过半数席位的大政党。它鼎盛时期号称议员300,俨然一大议会军团。直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党内矛盾加剧,1924年1月一分为二,成了政友会与政友本党两个党。不久,这两个党为新时期连续出现政党内阁的阶段奠定了组织基础。

伊藤创立政友会后当了3年总裁,1903年因任枢密院议长,将党总裁职位交给了西园寺公望。1913年起西园寺作为最后一个元老专门推荐首相人选。1914年原敬继任总裁。1921年原敬被人刺死后,高桥是清继任总裁。1925年高桥将总裁职位让给新加入政友会的田中义一。1929年田中死去,由犬养毅继任总裁。1932年犬养毅被法西斯暴徒刺死,由铃木喜三郎继任总裁。1939年政友会分裂为革新派(亲军、倾向法西斯)和正统派。革新派总裁为中岛知久平,正统派总裁由久原房之助担任,直到1940年7月党解散。1939年以前政友会先后由7任总裁领导。7位总裁中有藩阀开明派、宪政派元老(伊藤),有宫廷贵族开明派、宪政派元老(西园寺),有“平民”出身的政治家(原敬),有担任过日本银行总裁的财政金融家(高桥是清),有人称“宪政之神”的宪政运动领袖人物(犬养毅),也有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军阀首脑(田中义一)和东京帝大出身的司法官僚(铃木喜三郎)。无庸赘言,在经历和政治主张等各不相同的总裁领导下,政友会总会有曲折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按照伊藤的蓝图构筑。不过,从总的政策走向和政治面貌来看,政友会基本上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大政党,也没有完全使伊藤失望。诸如在对外扩张侵华政策上的种种表演,突出表现了该党的反动性。松冈洋右于1931年初刚当上政友会党员不久,就喊出“满蒙是我国(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反动口号,影响极为恶劣。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由藩阀出身的官僚组织政党的,除伊藤博文外要算是桂太郎。与伊藤不同,他是军阀巨头,是长州阀元老山县有朋的直系亲信。但他的头脑比山县要灵活得多。大正改元之初1913年发生的第一次护宪政治运动,将他的第3届桂内阁一下子冲垮,只落得两个月短而又短的政治寿命。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所谓“排(击)(藩)阀热”方兴未艾的1913年初,他就宣布要成立新党,想搞一个为他驱使的御用政党。照一位日本学者的说法,桂太郎企